

书信背后的故事

一封臧克家

陈剑萍

不久前,因事与吴泰昌老师小坐,偶然间见到了臧克家的一封信札,听到了一段难忘的作家友情。

信封上右下角印着“诗刊社”的字样,白色的宣纸竖向两次对折,信笺的右下方有淡墨色写意的远山和浮云,颇是浪漫、别致,内容如下——

鹏程万里
一路顺风
给
吴泰昌先生
克家(盖臧克家朱印)、郑曼问好 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

这是1988年8月,由吴强出任团长,由老、中、青三代人组成的中国文艺期刊代表团出访前苏联前夕,臧克家给临行前的吴泰昌写的贺信。短短的24个字里,寄托着当时83岁的大诗人臧克家与50岁的吴泰昌的忘年交的深厚友情。

臧克家是杰出诗人、作家、编辑家。因在“文革”中被下放到湖北咸宁“五七”干校,与吴泰昌初识,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1969年10月,中国作家协会人员全部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。吴泰昌与臧克家分在一个连队。连队住在向阳湖边的一个山村。臧克家是大诗人,吴泰昌只是一位小编辑,但同是受审查、被改造的对象。俩人同住在一间农舍的小土屋里,与他们同眠的,还有鸡笼里一只爱啼叫的公鸡。当时臧克家已逾花甲之年,他和年轻人一样下湖垦田,风雨不歇。下工后他还兼管连队阅览室,他将稀少的书刊整理得井井有条。吴泰昌当时在伙房,除下湖送饭、挑水,还常去贺胜桥、丁泗桥一带买菜,不时给

臧老捎些点心。

北伐时期,臧克家在叶挺部队,到这两个小镇打过仗,他常常跟人回忆起青年时那段从戎的岁月。臧克家的爱人郑曼在干校另一个连队,相距二三十里,小女苏伊在县城上小学。臧克家时不时会请吴泰昌去看看他们,捎点他省下来的咸鸭蛋。每次郑曼都会叮嘱吴泰昌提醒克家照顾好自己。臧克家有早睡早起的习惯,为了不影响他,吴泰昌也慢慢习惯了早睡。有一天晚上,大约10点钟左右,吴泰昌刚进入梦乡,就被浑浊的声音弄醒,打开灯,只见臧克家面部极度紧张痛苦,用手紧紧捂住胸口,吃力地对吴泰昌说,“心脏病犯了,快去帮我找大夫。”

吴泰昌顾不上穿好衣服,急忙摸黑儿去找连队的医生,医生给他吃了救急药。连里医务室药品设备简陋,吴泰昌又去五六里地外的校部医院找来值班大夫。经校医院大夫仔细检查、治疗,他的病情才渐渐稳定下来,安详地入睡了。这时,黎明已悄悄到来。事后才知道,他平日心脏就不好,这次突发,是因长期劳累引发的。

这是40多年前的往事。吴泰昌已渐渐淡忘了,臧克家却一直挂在心上,1994年6月23日,吴泰昌收到臧克家托人带来的一封信,信是22日写的,并附有当天写的一首赠诗作的手抄稿,他在诗的附记中说:“午梦泰昌,醒后即即兴草成十六句以赠。”《赠泰昌》不久在《诗刊》发表,事后又收入了他的一本诗词选集中。一年后,文艺界隆重庆祝臧克家九十华诞之际,他又特意将这首诗书写后赠与吴泰昌。诗的前8句是忆旧,后8句是对吴泰昌的鼓励与期望:“老来长忆旧,江南联席亲。土屋天地窄,与鸡共三人。夜深心病发,赖君报急音,转危蒙天相,健在九十春。胸食十里外,一挑二百斤。扁担压弓腰,哎哟作呻吟。五年六万里,磨磨难炼真身。双肩成钢铁,于今当大任。”诗人在条幅上还题注:“俚语打真情,往事两心知。”

巧的是,1988年那次访问前苏联,9月1日到达莫斯科,吴泰昌没有休息就去红场参观,晚餐又喝了少许伏特加,心脏突然早搏,吓得团长吴强和大夫忙了一阵。回国后,听说此事的臧克家专门约了吴泰昌到家,劝说他要调整好自己的生活规律,少喝酒,不抽烟。后来,吴泰昌就真的把烟戒了。

一晃,臧克家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。这封珍藏了31年的记录着吴泰昌与臧克家友情的短信,首次公开与公众见面了,亮相在2019年11月10日正式开馆的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“吴泰昌文学馆”中,永久地纪念他们之间的友谊。

对所谓“短篇王”的说明

刘庆邦

我在北京或去外地参加一些活动,主办方介绍我时,往往会把我当成是什么“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”。每每听到这样的介绍,我从没有得意过,都是顿感如针芒在背,很不自在。有时实在忍不住,我会说一句不敢当,或者说一句我就是写短篇小说多一点而已。在更多的情况下,我只能听之藐藐,一笑置之。

有记者采访我,问到我对这个称谓的看法时,我说人家这样说,是鼓励你,抬举你,但自己万万不可当真,当真就可笑了,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历来是无文第一,武无第二,写小说,哪里有什么王不王之说。踢球可以有球星,拳击可以有拳王,写小说却不能称王。我甚至说:王与亡同音,谁敢称王,离灭亡就不远了。我自己写文章也说到过:所谓“短篇王”,不过是一顶高帽子,而且是一顶用废旧报纸糊成的高帽子,雨一淋,纸就褪色了,风一刮,高帽子就会随风而去。我这样说,是自我摘帽的意思。我知道,中国作家中写短篇小说的高手很多,我一口气就能举出十几个,哪里就轮得上把我抬得那么高呢!我有别的短篇小说写得也很一般,没多少精彩可言。读者看了会说,什么“短篇王”,原来不过如此。高帽之下实难符,还是及早把帽子摘下来扔掉好一些。可是,戴帽容易摘帽难,摘有形的帽子容易,摘无形的帽子难,这么多年,我连揪带拽,一次又一次往下摘,就是摘不掉。相反,时间长了,这顶帽子仿佛成了“名牌”,传得越来越广,出于好心,给我戴这顶帽子的人也越来越多,这可怎么得了!这甚至让我想到,人世还有别的一些帽子,那些帽子一旦戴上,恐怕一辈子都摘不掉。有的帽子虽然被政策之手摘掉了,帽子前面还有可能被冠以“摘帽”二字,摘与不摘也差不多。

2004年,孟繁华先生主编了一套“短篇王”文集,收入了我的短篇小说集《女儿家》。我觉得很好,真的很好。我之所以诚心为这个文集叫好,不仅是因为文丛中收入了我的短篇集,更重要的是,文丛分为三辑,先后收录了18位作家的短篇小说集。这样一来,“短篇王”就不再是我一个,而是有好多个,大家都是“短篇王”,又都不是“短篇王”,“短篇王”不再是一个特指,成了一个泛指,等于把这个称号分散了,消解了。我对繁华兄心存感激,感觉他好像让众多作家朋友为我分担了压力,让我放下了包袱,变得轻松起来。我明白他编这套丛书的真正良苦意图,是为了“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,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”。但出于私心,我还是

希望从此后别人不再拿“短篇王”跟我说事儿。实际上没有出现我想要的结果,我不但没有摘掉帽子,得到解脱,把我说成“短篇王”的说法反而比以前还多,在文学方面,“短篇王”几乎成了刘庆邦的代名词。这不好,很不好!有一次在会上,我以开玩笑的口气说:除了写短篇小说,我还写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,我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写得也不差呀!

我拒绝当“短篇王”,也许有的朋友会认为我是假谦虚,是得便宜卖乖,别人想当“短篇王”还当不上呢,你有了“短篇王”的名头,短篇小说至少会卖得好一些,这没什么不好!有一次,连张洁大姐都正色地对我说:庆邦,你不必谦虚,不要不好意思,“短篇王”就是“短篇王”,要当得理直气壮!可是不行啊大姐,在这个问题上,我像是患有某种心理障碍一样,一听到这样的称谓,我从来就不感到愉悦,带给我的只能是不安。

忽一日,有位为我编创作年谱的朋友问我,关于“短篇王”的说法是谁最先说出来的?这一问倒是提醒了我,是呀,水有源,树有根,这个事情不能一直含糊着,含糊着容易让人生疑,还有可能让人误以为是一种炒作,作为当事人,我还是把它的来历说清楚好一些。

最早肯定我短篇小说创作的是王安忆。她在给我的一本小说集《心疼初恋》的序言里写道:“谈刘庆邦应当从短篇小说谈起,因为我认为这是他创作中最好的一种。我甚至很难想到,还有谁能够像他这样,持续地写这样多的好短篇。”我注意到了,王安忆的评价里有一个定语叫“持续地”,是的,40多年来,我一直在“持续地”写短篇小说,从没有中断,迄今已发表了300多篇短篇小说。我还从王安忆的评价里看出了排他的意思,但她没有给我命名。

随后,李敬泽在评论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时,说到了与王安忆差不多同样的意思,他说:“在汪曾祺之后,短篇小说写得好的,如果让我选,我就选刘庆邦。他的短篇小说显然是越写越好。”我以前从没有这样想过,更不敢这样比较,敬泽的话对我的创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。

那么,在王安忆和李敬泽评价的基础上,是哪位先生?在什么情况下?把我说成了“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”呢?我记得清清楚楚,是被称为“京城四大名编”之一的崔道怡老师。2001年秋天,我的短篇小说《鞋》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9月22日,在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,颁奖典礼在鲁迅故乡绍兴举行。当年,我的另一篇短篇小说《小小的船》获得了《中国作家》“精短小说征文”奖。记得同时获奖的还有宗璞、石舒清等作家的短篇小说。从绍兴回到北京的第二天,我就去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参加了颁奖会。崔道怡老师作为征文评奖的一个评委代表,也参加了颁奖会,并对获奖作品一一进行了点评。崔道怡是一位非常认真的文学前辈,我曾多次和他一起参加文学活动,见他只要发言,必定事先写成稿子,把稿子念得有板有眼,抑扬顿挫,颇具感染力。人的记忆有一定的选择性,那

天崔道怡老师怎样点评我的小说,我没有记住,倒是有一句话听得我一惊,一下子就记住了。崔道怡老师的原话是:“被称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”如何如何,我什么时候有这个称谓,我怎么没听说过?这未免太吓人了吧!

不光我自己吃惊,当时在座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锬先生也有些吃惊。后来,张锬先生以“致刘庆邦”的书信形式写了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你建构了一个美的情感世界》,发在2002年2月9日的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上。文章里说:“编辑家崔道怡同志说你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,对他的这种评价,连我这个一直在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你的人,也不由得被吓了一跳。”张锬先生给我的信写得长长的,提到我的短篇小说《梅姐放羊》《响器》《夜色》等,也说了很多对我的短篇小说创作肯定的话,这里就不再引述了。

我愿意承认,在《人民文学》当副主编的崔道怡老师为我发了好几个短篇,他对我是提携的,对我的创作情况是了解的。我必须承认,崔道怡老师对我短篇小说创作的评价,对我构成了一种压力,也构成了一种鞭策般的动力。我想,我得争取把短篇小说写得更多一些,更好一些,以对得起崔道怡老师对我的评价,不辜负他对我期望。不然的话,我也许会把费心费神、又挣不到多少稿费的短篇小说创作放下,去编电视剧,或做别的事情去了。“短篇王”的命名像小鞭子一样在后面鞭策着我,让我与短篇小说相爱相守到如今,从没有放弃短篇小说的创作。就拿今年来说,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,我已经完成了12篇短篇小说,仅7月份就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作家》等杂志发表了5篇,其中有两篇分别被《小说选刊》和《小说月报》选载。

“短篇王”的帽子我不愿戴下去,是我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失去写短篇小说的能力。这个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,既需要智力、心力、耐力,也需要体力、精力、爆发力,也许还有别的因素。以前,我对自己写短篇小说的能力充满信心,相信自己会一直写下去,活到老,写到老。最近读了张新颖先生所著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,我才知道,一个作家写短篇小说的能力可能会失去。沈从文对自己写短篇小说的能力曾经是那么自信,他不止一次对家人表示,他要向契诃夫学习,在有生之年再写一二十本书,在纪录上超过契诃夫。可是呢,后来他一篇都写不成了。有一篇《老同志》,他改了7稿,前后历时近两年,还向丁玲求助,到底也未发出。1957年8月,他又写了一个短篇,写时自我感觉不错,“简直下笔如有神”。但他的小说刚到妻子张兆和那里就被否定了,要他暂时不要拿出来。沈从文不得不哀叹,他失去了写短篇的能力。他还在给大哥的信里说:“一失去,想找回来,不容易……人难成而易毁……”

当然了,沈从文之所以失去了写短篇的能力,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,他身心受到巨大冲击,一时无所适从,在失去自我的同时,才失去了写短篇的能力。

我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候,在国泰民安的环境里,能够心态平稳地持续写作。我会抱着学习的态度,继续学习写短篇小说。我不怕失败,也不怕别人说我写得多。好比农民种田,矿工挖煤,一个人的勤奋劳动,也许得不到多少回报,但永远不会构成耻辱。

悲悯:从敬畏一张白纸开始

侯颖



头山,人在下面行走,像走在迷宫里,如蚂蚁一样小。

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多木头,一段段的棕色木头,像无数大人和孩子的手臂,交叉叠放在一起,等待华丽变身为一一张张洁白无瑕的纸张。厂长不无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说,这些是进口木材,印刷厂的铜版纸就是这些木材制作的。他们的工厂是世界著名的几个大造纸厂之一,产品远销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,国内的印刷厂也是拿钱等着买他们高质量的产品。

为能参观这么高大上的造纸厂,内心感到十分荣幸和骄傲。进入车间参观的时候,看到每一座宏伟的高炉边上,都站着一个包裹严实汗流浹背的工人,我们距离还有二十多米远,就再也无法往前挪动一步,一股热浪排山倒海地袭来,大家连忙跑出车间,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。

成品车间,一卷一卷白如雪、薄如锦缎的巨大白纸卷,像新出锅的巨无霸热馒头一样,弥漫着别样的香味,熟悉而清新,正准备打好包装,穿好衣服,然后装车,被运送到世界各地的印刷厂。各种各样的文字图画将在这些白纸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,成为许多人实现文化、知识、科学、艺术和梦想的园地。

凝视这些白纸和外面的木头山,我联想到

纸张的前世,准确地说,纸张小时候应该是一片片森林,确实确实就是一片片茂密的森林。

一部超级畅销书,可能需要一整座森林。曾经的森林,也许是无数动植物的家园,是鸟的故乡,而这些印在上面的字和说出的话,一定要有良知和价值,不能胡言乱语。在我看来,那些创作和出版质量低下产品的作者和出版者,堪比罪犯,他们在浪费人类最可宝贵的森林资源。

自此之后,那一张张白纸,像一只只纯洁的白鸽,一声声鸟的鸣叫,一片片绿色的云朵,总是飞到我的眼前,呢喃低语或者小声啜泣。

悲悯那无数的生灵,让我对纸张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珍惜和怜爱,更有一种深深的敬畏。

作为责任编辑出版不好的图书,像犯罪一样。对自己的写作尽量严格要求,希望自己的作品不要像垃圾一样玷污了洁白无瑕、一张张比金子还珍稀的白纸。

不可再生的原始森林,那可是无数生灵和美丽大鸟的家园。

一张白纸,一棵树木,一只大鸟,一份爱心,因缘际会,无论如何,永远都不可能回到原初的梦幻。

悲悯,从敬畏一张白纸开始吧。

月饼趣话

邢秀玲



每一个农历的重要节日,都关联着一种特定的美食:大年初一的饺子,正月十五的汤圆,清明节的“寒食”,端午节的粽子,中秋节的月饼……每种美食或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,或萦绕着一段古老传说,或牵系着一缕仙乐花香……

月饼是献给月亮娘娘的礼物。记得孩提时代,每逢八月十五的晚上,月儿当空之时,在那片清澈的银辉中,举行拜月仪式:将方桌或长桌置于月光下,摆上专门蒸好的大月饼,还要献上水果、鲜花等供品,燃上香烛,供奉一个时辰后,才能撤下,由家人一起享用。那时候,我最盼过中秋节,因为新麦子刚打下来,磨出的面粉细而精,蒸出的月饼特别好吃!瓜果也最齐全,有青海高原出产的花青、沙果、梨子、橙子等,也有新疆的哈密瓜、兰州的白兰瓜、陕西的石榴等。这些外地的特产平素很难买得到,只有中秋节才能饱餐一顿。

瓜果虽然有限,但月饼可以连续吃几天,三条六眷还要互相送月饼,那正是家庭主妇展示厨艺的最佳机会,都要精心制作,花样翻新,以期得到亲友的赞誉。记得我大姑做月饼的手艺最高明,做的过程也很繁琐:磨好的白面再用细箩筛过,和面要用花椒水,发面的时间要掌握好,碱面要揉匀,揉好的面团用擀杖擀开,撒上红曲、姜黄、香豆等天然色素,再一层层擀好,用力擀平团在一起,蒸出来的月饼五色斑斓,层次分明,煞是好看。大姑还有一手绝活,在月饼放进蒸笼前,贴上用各色彩面做的红花、绿叶、白兔、翠鸟等,蒸熟的月饼越发鲜美灵动,惹人喜爱。后来,我也学会了做花的技术,但未等我充分发挥才艺,1960年的饥馑降临了,别说做月饼,连白面馒头都难得一见,稀得照见人影的菜汤倒成了家常便饭。

那年的中秋节,省城一位亲戚到我家做客,带来一包红糖花生馅的小月饼,这种机制的月饼远没有手工蒸的月饼新鲜,但在生活困难时期,成为稀罕之物,谁也舍不得吃,得保存

下来当礼物。不久,一位老人病了,探望的差事落到我头上,我就带了这包月饼前往,在当时也算是一份厚礼。转眼之间,又到第二年中秋节,表姐来看望我母亲,也带来一包月饼,打开一看,原来是我送出去的那包,不知转了多少家,又转回“原窝”来了。包装纸已破损,馅儿也发霉了,那无疑是致癌的黄曲霉菌,幸亏都没舍得吃,否则,后果不堪设想。

结婚后,我把这个“月饼转回家”的故事讲给丈夫听,不料又引出他亲历的一段月饼趣闻:大学毕业第二年,他和同学小孙被派到民和县“整社”,离他俩教书的学有300里之遥,当时交通不方便,半年未回学校。快到中秋节了,县上领导为照顾下乡的干部,发给每人半斤月饼票,他俩将票合在一起,买回一斤月饼(4个),考虑到房东老大娘待他俩不错,每天设法粗粮细做,让两个小伙子基本上吃饱了肚子。为了表示感谢,他俩分出两个月饼送给了房东。留下两个,先拿出一个想掰开,每人一半。可能是月饼里没有放油,存放时间又太久,硬得根本掰不开;又借来房东的菜刀,切了半天,仅仅划出一道白印子。小孙有点急了,一把抓起月饼,就往饭桌边上狠狠砸去,只听“梆”的一声,桌子被砸掉了一个角,月饼却完好无损……他讲得绘声绘色,我听得差点笑岔了气。

这类有关月饼的趣事,早已湮灭在记忆深处了,现在旧话重提,年轻人肯定不会相信。如今的月饼外观越来越好看,口味也越来越多样:川味、广味、苏味应有尽有,价位从每个数元到每盒数百元不等,任凭选择。

我曾买过各种馅的散装月饼,也吃过过包装极其漂亮的高价月饼,但最让我向往的,还是故乡的蒸笼里蒸出的小麦面月饼,可惜山遥水远,无法再度品尝,何况,做月饼的手艺已经失传,如今的家庭主妇,都乐意到超市买成品月饼,谁还会做那种程序复杂、费时费力的手工月饼呢!



开始练习毛笔字,缘于自己画了半年的素描,厚厚地堆积在那里,想把这些素描纸扔掉,觉得可惜,在上面写毛笔字,画上墨汁,便没有保留的必要了。

以前练习毛笔字,要么在报纸上写,报纸不吃墨汁不说,还干得慢,更没有黑白对比的鲜明;要么蘸水在布上反复练习,笔画还没到位,水就干了,字支离破碎,或者水滴积成一个个小水洼,像哭泣的眼泪。

对于我来说,在白纸上练习毛笔字还是第一次。

一斤墨汁、一支毛笔、一个墨盘、一张毛毡,加一起二十多元钱,写上好长时间,才可能把我画过的素描纸写完。

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,喜欢物尽其用。这些白色素描纸,被我正反两面都画上了铅笔画。

从现在开始,我还打算正反两面都写上毛笔字,写满密密麻麻的黑色笔画,让它们再也看不出曾经作为一张白纸的本来面目。作为一张白纸,这样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
为什么自己在使用白纸上,会有如此吝嗷的表现呢?

只要一张白纸,没有写满字被丢弃,在我心里,便会产生一种深深的罪恶感。

是什么时候?怎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心理阴影?我努力寻找原因。

忽然,想起在出版社工作时,曾去参观国内一家造纸厂。已经念了二十多年书,做了十几年图书编辑,一个跟纸质图书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,却从未亲眼看见一张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。

十几年前的一个深秋,单位组织大家去参观一家造纸厂,对我的内心来说,却产生了强烈的刺痛,那刺痛如此强烈而鲜明,并历久弥新。造纸厂坐落在一个城市的郊区,像一座壁垒森严的巨大城堡。

造纸厂有上万名工人,一进入造纸厂的院子,就可以看见排列着无数台摩托车,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摩托车,在班台下发出油亮的光芒。造纸厂工人的工作是三班倒,从未有让机器休息的时间。

造纸厂院子里,另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木材,被截断为一米来长、一段一段滚圆的木头,堆放成一堆一座的高山,是高耸入云的木